

斟證史記十七年（代序）

王 叔 岷

壹、引 言

莊子、史記、陶淵明集，是我年輕時就最喜歡讀的三部書。我寫得不够成熟的莊子校釋和相當繁瑣的陶淵明詩箋證稿，已經先後流傳於學術界。史記這部大書，我還在繼續下功夫，希望我所研究的成果，對學術界的同好稍有用處。

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，那時我剛十二歲，隨著先父寓居成都，先父白天在他和朋友創辦的女子中學教書，晚間教我的詩文。文章中選讀史記項羽本紀、留侯世家、伯夷列傳、信陵君列傳、淮陰侯列傳及游俠列傳諸篇，並練習圈點，用的是蜀刻大字本。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史記這部書。我喜歡司馬遷行文的雄奇變化，寓意的深遠曲折。我十四歲進中學時，教師也教史記，用的是史記菁華本，沒甚麼意思。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，我就讀四川大學中文系，有位李炳英先生，談到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這部書，這部書資料豐富，最可貴的是補充張守節正義一千多條。李先生命高班同學把這些佚文過錄出來，印成一本專書，名為史記正義佚文，當時我還買了一本，但關於史記會注考證卻沒有見到。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我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，因為校釋莊子，收輯有關資料，參考史記會注考證，發現一些可以補充、修訂的問題。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初，我追隨傅故校長斯年先生到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書，傅先生特別邀聘在學術上有成就而又熱心的教師教大一國文，他選定教孟子和史記。他為甚麼選定教這兩部書？我想，傅先生高昂磅礴的氣魄，跟孟子的浩然之氣很相近。傅先生學問的淵博，見解的特出，文筆的雄奇，跟司馬遷很相近。因此，不期然而然的選這兩部書作大一教材。那時我教史記，參考好些直接間接的資

料，經常有些新發現，有些新的意見。臺大圖書館珍藏影印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兩厚冊，其中有敦煌殘本史記三篇，即燕召公世家、管蔡世家及伯夷列傳，爲史記會注考證所未收。字句與現今各傳本頗有出入，往往一字千金，如伯夷列傳：

伯夷、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，父欲立叔齊，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，伯夷曰：『父命也。』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。

關於『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』句，從沒有人懷疑過。我們想，伯夷逃去，叔齊也逃去，各逃各的，怎麼兩弟兄隨後又在一起，同隱於首陽山呢？我們看，敦煌本『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』這句，逃字作追，這就對了，伯夷逃去，叔齊追他，隨後自然就一起隱居了。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四引這句話，逃字也作追，可以證明，到北宋時還有作追的本子。追字作逃，是涉上句『逃去』而誤的。這三篇敦煌殘本，一字一句與今本出入處，我都詳細校過。民國四十八年，我休假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，經常在哈佛燕京學社的漢和圖書館看書，發現日本影印的古寫本史記文帝本紀、河渠書、酈食其陸賈列傳及張丞相列傳四篇，前三篇史記會注考證列在鈔本參考書目內，並且已經採用，但並未詳校。第四篇張丞相列傳根本未校過，卻列在參考書目內。因此，我把這四篇細心校錄，校錄的原稿，現在還保存。前面我述說的，不過是我注意史記這部書和收輯部分資料的一段經過，那時我已經存心要斟證史記，如何斟證，我漸漸已有一個構想。

貳、斟證史記的經過

我正式撰寫史記斟證，始於民國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）一月，至三月二十四日，寫成史記斟證導論一篇，導論的內容包括：

壹、史記名稱探源

一、史記名稱見於載籍之始。二、史官記事之書通稱史記。三、司馬遷史記之本名。四、太史公書稱史記之始。

貳、近人整理史記成果。

一、張森楷史記新校注五稿十冊，六稿兩冊。二、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十冊。三、日本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九冊。四、陳槃讀史記世家綴

錄一百三十九條。五、張以仁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八十八條。六、施之勉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考校甚多，頗見工苦。

叁、史記斟證

一、字句整理。二、史實探索。三、陳言佐證。四、佚文輯錄。五、舊注斟補。

那時我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書，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分出部分時間，完成這篇作為斟證史記基礎的導論。發表在民國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）的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八本。以後我展轉在臺灣大學、馬來亞大學、南洋大學、和最後一年（一九八〇——八一）在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執教，教書、指導、或處理系務及應付一切瑣事之暇，大部分心力都在繼續撰寫史記斟證。每年大約平均寫二十萬字，當然，其間也偶爾寫別的文章。一面寫，一面發表。寫得快，發表得慢。大都發表在史語所集刊、或中央研究院刊、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。只有朝鮮列傳斟證這篇，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）發表在大韓民國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的東洋學第二輯，這是我應邀出席東洋學學會提出的一篇論文。關於史記斟證導論這篇，因為我寫斟證的經驗不斷增加，民國六十年（一九七一）七月四日，我又重加補訂，發表在南洋大學的南洋學報第五期。（上面所舉的導論內容，是參照補訂稿寫的。）斟證史記，從民國五十四年一月寫導論開始，預期在今年年底全部脫稿，整整寫十七年。我作事總比預期快，八月十八日最後一篇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已經斟證完畢。寫完最後一句，了卻一大心願。

參、斟證史記的次序

我斟證史記的次序，是先本紀，次世家，再次列傳，及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。因為這三部分研究參考的學人比較多，先寫好發表，與人方便，自己也方便。所謂與人方便，是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貢獻給別人。所謂自己也方便，如果自己的意見發表後有不妥不盡之處，別人提出來，自己也好補正。我們史語所的習慣很好，每組同仁要發表的文章，都得經過本組主持人審定，再經過講論會上的研討，然後才發表，當然就放心得多。記得我發表斟證的本紀及世家時，成功大學的施之勉先生也在發表他寫的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。他經常在大陸雜誌發表，大陸雜誌是月刊，施先生每篇札記內

容不多，他寫得快，發表也快。我寫的斟證，在史語所集刊或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，集刊和學報每年不易出刊一次，我寫的斟證每篇很長，但也寫得快，而發表卻非常慢！施先生似乎又有意搶先，本來我有些篇數發表在他的札記之前，漸漸就落後了。不過，同樣研究一部書，先發表意見，有好處，也有壞處，好處是，有些參考資料都收輯到了，你先發表，別人就不便再用。壞處是，別人的功力如果比你深，你發表的意見，往往給別人發現漏洞的機會。我已經發表的本紀、世家、列傳各篇斟證，向我索取抽印本的人很多，（施之勉先生也在索取。）有的我自己只保存一分了。太史公自序斟證是六十七年（一九七八）六月十日脫稿的。然後繼續斟證八書，八書所以記述制度沿革的大概情形，（本日知錄二十六引朱鶴齡語。）內容繁富，牽涉問題太多，譬如天官書，我根本缺乏天文的常識，不得不借助於朱文鑫的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（商務印書館發行），及高平子的史記天官書今註（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）。還有，我在馬來亞大學漢學系教學時的好友何丙郁教授，他精通天文，十多年前，他約我共同整理天官書，那時我正在斟證列傳，推到以後再說，但以後勞燕分飛，沒機會向他求得新知了！我雖然不懂天文，但對於天官書資料方面的印證，字句方面的校理，還是費了一番心血。六十八年（一九七九）八月十四日，把八書中的最後一篇平準書斟證完畢，開始斟證十表，這是斟證史記的最後部分，十表貫穿日月，記述治亂興亡的大概情形，（亦本朱鶴齡語。）牽涉到全書，留在最後斟證，根據已詳細寫過的問題來寫，比較輕鬆；順便把過去寫的清理一遍，有不妥不備之處，也好加以修訂。目前已經寫好的斟證，還有五、六十萬字未發表。

肆、斟證史記的態度

司馬遷寫史記，對於他所愛憐的人，如魏公子無忌、項羽、韓信及游俠列傳中的郭解等，即使他們有被世俗之見認為不是處，司馬遷在字裏行間，往往為他們回護。但回護得不失公正。我對司馬遷博大精深的才學，非常崇拜；對他殘酷的遭遇，非常惋惜。我斟證史記的態度，遇到後人對史記有疑難處加以指責，我往往為司馬遷辯護。史記百卅篇，包羅萬象，不能無所疏失。然而因為流傳既久，很多錯誤，都是由於後人的傳鈔、刊刻甚至於妄改而來，譬如史記中常見的七、十兩個字，往往互誤，

我發現有六十幾處之多。後人或說七誤爲十，或說十誤爲七，但不知其所以然。他們未進一步想，隸書是漢代的通行書，七字的隸書作十，橫筆長縱筆短，漢簡中的七字，很多都這樣寫。史記中的七字，原來也應該作十。（漢書中的七字，原來也是一樣。）後人傳鈔刊刻，便錯成橫縱並長的十字，因此，七、十兩字就往往互誤了。不過，像這類的問題，後人還不致於輕易歸咎於司馬遷，有時遇到一些大問題，如孔子世家：

孔子生鯉，字伯魚。……伯魚生伋，字子思。……子思生白，字子上。……子上生求，字子家。……子家生箕，字子京。……子京生穿，字子高。……子高生子慎。……子慎生鮒，……鮒弟子襄。……子襄生忠，……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國。

自『孔子生鯉，』計至『武生延年及安國，』可知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。尚書序孔穎達疏引世家這段話，並且說：『孔子世家云，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。』論語序邢昺疏也說：『史記世家，安國，孔子十一世孫。』可見孔、邢二氏所見孔子世家關於孔子後代的記載，都跟現今的傳本相合，即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。然而安國卻不是孔子的十一世孫，而是十世孫。問題出在世家這段話最後『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國』兩句。關於這兩句，梁玉繩的史記志疑說：

孔光傳：『忠生武及國，武生延年。』後序：『季中生武及子國（安國字）。』

唐表：『忠二子武、安國，武生延年。』則史以安國爲武子，誤也。

根據漢書孔光傳、孔子家語後序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脈相承的記載，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世孫，梁氏斷定惟有史記記載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是錯誤的。還有敦煌本尚書目錄（伯目二五四九），卷末有孔安國小傳：『孔國，字子國。又曰孔安國，漢武帝時爲臨淮太守，孔子十世孫。』更可以加強梁說的證據。五十九年（一九七〇）的秋天，我在馬來亞大學教書，同事陳鐵凡先生，根據孔安國小傳，加上梁玉繩的意見，寫篇文章，推波助瀾，暢論司馬遷敘述孔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的錯誤，把文章給我看。我說：『史記這部書太大，內容太寬，司馬遷記事，當然難免錯誤。不過，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們應該多想想，漢書儒林傳說：「司馬遷從安國問故。」司馬遷是孔安國的學生，把老師的弟兄（孔武）弄成老師的父親去了，司馬遷有這樣荒唐嗎？關於

世家記載孔子的後代，最後「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國。」兩句。我認為「及安國」三個字，本來在「忠生武」下，原文本作「忠生武及安國，武生延年。」安國是孔子的十世孫。後人傳鈔把「及安國」三字誤倒在「武生延年」下（孔穎達所見本已誤。）安國就降成孔子的十一世孫了。漢書記事與史記相關的資料，大都根據史記，孔光傳所謂「忠生武及安國，武生延年。」正保存世家這兩句的本來面目。我們應該斷定今傳世家作「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國。」是後人傳鈔之誤，不應該歸咎於司馬遷。』陳先生聽了我這番話，覺得有道理，馬上加進他的文章裏就發表了。像這類的問題，我總是有心爲司馬遷辯護，爲問題得到比較適當的解答，並非阿其所好。

伍、斟證史記的新經驗

研究學問所下的功夫愈細，所得的經驗就愈多。有時多下一天功夫，所得的經驗都不同。多下功夫的人判斷問題，有時會如陶淵明所說的，『覺今是而昨非。』不過，多下功夫判斷即使是「非」，也是得來不易的。譬如清朝乾、嘉時代高郵王念孫、引之父子，他們考校古書，不說他們判斷的「是」，不容易趕上；即使要趕上他們判斷的「非」，也要下很多年功夫！經驗是日積月累，不容易得到的。這裏，只談我運用古注、類書斟證史記，所得到的幾點新經驗。這幾點新經驗，是前賢弄不清楚的。我從前寫斟讎學時，也還未肯定的。

一、古注引書，於他書相關之字，往往改從本書。

如司馬相如傳：臚此鷁鷁。

裴駟集解：『郭璞曰：鷁，鷁鷁也。』

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鷁作盧，郭璞注：『盧，盧鷁也。』集解引郭注兩盧字並作鷁，是依史文作鷁而改的。如果以爲郭璞所見的漢傳也作鷁，那就錯了。

二、古注、類書引書，於兩書同見之文，往往引自較晚之書，而標時代較早之書名。

如太史公自序：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，必陷篡弑之誅，死罪之名。

梁玉繩志疑云：『必陷篡弑之誅，死罪之名。』後漢書儒林傳論注引史作『必陷篡弑誅死之罪。』豈誤以漢書爲史記邪？

案後漢書李賢注所引史記『必陷篡弑誅死之罪』句，是本於漢書司馬遷傳。據漢書而標史記之名，即據較晚之書而標較早之書名，這是古注引書的慣例，不是誤引。

又如御覽卷二百八十引史記曰：『田橫據有齊地，漢將韓信、灌嬰平齊地，橫走歸彭越。漢滅項籍後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鵠中。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：「橫來，大者王，小者乃侯。（原注：大者謂橫身，小者謂徒屬。）不來，發兵加誅。」……』

所引這段記載很長，並見於史記、漢書田儋傳。標的書名是史記，其實引的是漢書。所附引的注，是顏師古注，更可證明。這也是類書引書，據較晚的書，而標較早的書名的慣例。類書引自漢書而標史記之名的例證很多，正好用來校理漢書，可惜王先謙寫漢書補注把這類資料都忽略了！

三、類書引書，於兩書同見之文，往往引自較早之書，而標較晚而習見之書名。

如御覽卷三百二十八引史記曰：『齊使魯連爲書，以箭射之，遺燕將曰：「吾聞之，知者不背時而棄利，勇者不怯死而滅名，忠臣不先身而後君。忠廢名滅，後代無稱，非智也。且吾聞，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，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。……」』

戰國策齊策六、史記魯仲連傳都有這段記載，而御覽所引，與史記的字句較遠，與戰國策的字句最合。（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引這段記載，標題作齊魯仲連與燕將書，也本於戰國策。但既不稱戰國策，也不稱史記。）實是本於戰國策。因參考戰國策的人較少，史記是習見之書，所以標史記之名。

四、類書引書，如兩書同載一事，往往兼引兩書之文。

如景宋本白帖卷六引史記曰：『衛宣公與伋子白旄，告盜曰：「見白旄，殺之。」壽子聞之，載其旌而往，盜殺之。伋子至，曰：「我之求也，彼何罪焉！」盜又殺之。』

案史記衛世家載此事，作『〔宣公〕使太子伋於齊，而令盜遮界上殺之。與太子白旄，而告界盜：「見持白旄者殺之。」壽，太子異母弟也，乃盜其白旄，而先馳至界，界盜見其驗，即殺之。太子伋至，謂盜曰：「所當殺乃我也！」盜并殺太子伋。』（節引。）左傳桓公十六年也載此事，作『〔宣〕公使〔急子〕諸齊，使盜待諸莒，

將殺之。壽子載其旌以先，盜殺之。急子至，曰：「我之求也，此何罪。請殺我乎！」又殺之。」（亦節引。）很明顯，白帖所引，前半跟史記較合，後半跟左傳較合，而統稱為史記。一個故事，兼引兩書，而只標一個書名，這不是錯，這也是類書引書的慣例。

上面四條，是古注、類書引書的慣例。經過很多年的考慮，我才決定下來。如果不了解，難免錯下判斷。把所引的資料辨別清楚，那些字句是屬於本書的，那些字句是屬於別的書的，不僅校理本書有用，校理別的書也頗有用處。

陸、酈證史記的甘苦

史記百卅篇，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。（太史公自序。）取材廣博，約可分為六類，一、經傳子史。二、騷賦風謠。三、雜書（奇聞異說、醫卜星相等）。四、檔案。五、傳聞。六、親見（遊歷及交游。）又以極雄厚的學養，極高超的眼光，極博大的才力，綜合貫穿而成書。可以說博極古今，包羅萬象。可稱為一切學問的學問，如史學、經學、諸子學、文學、醫學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民族、考古、天文、地理、及語言、訓詁、校勘等學，應有盡有。傅斯年先生曾說：『如果想以一人之力成史記之考證，是辦不到的。』（傅孟真先生集中編戊、史記研究參考品類。）史記自三家注以後，校注方面成就最大的，當推清乾、嘉時代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三十六卷，幾乎經歷二十年，五次易稿才寫定。（梁氏自序及錢大昕序。）其次是民國初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稿二百六十六卷，歷時五十年，六次易稿才完成。（存稿有殘缺，詳楊家駱記史纂閣所藏張氏史記新校注稿二百六十六卷。）時賢施之勉的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，成書時更名史記會注考證訂補，根據他先後發表的年月，大約也經歷十年的工苦。我自幼好讀史記，起初只計劃寫史記集證一部，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五月十八日，我在將出版的諸子斟證自序中有幾句話：『近正整理司馬遷史記，旁搜博采，創獲甚豐，擬於三數年內完成史記集證一部。』（諸子斟證於五十三年四月由臺北世界書局出版。）當時我只是收集資料，以後資料越收越多，到五十四年，我正式用史記斟證的名稱開始撰寫，問題越寫越多，下筆不能自休，竟至將寫滿十七年！每天教書、指導、應付瑣事之暇，便伏案撰寫，集中心力，不知厭倦，但一放下筆，就感到

疲困不支了！經過一晚休息，第二天一有空，又繼續撰寫。有時學生有問題來見我，問我有沒有時間，我說：『你來我就有時間，你不來我就沒有時間。』於是先把學生的問題解決，再繼續寫。到了長假期間，朋友們都休息或旅遊去了，我卻以為我的時間到了，這是全屬於我的時間，更加倍利用，加倍寫斟證。就這樣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一年復一年地寫下去。我沒有時間把寫好的斟證稿多修改一次，寫完一篇，就留待發表，不像梁玉繩、張森楷他們的著作，經過五、六次易稿才寫定。我總覺得時間不夠，要趕快寫，加緊寫。不過，雖然我發表的各篇斟證都是初稿，我下筆時還是相當謹慎。因為我的才、學、識都有限，自然有些意見，難免不妥不安。如果說稍有成就，僅僅是在斟勘方面，以及牽涉經、史、子、集及其他雜書，解決若干考證問題。還有很多問題，不能不借重其他專家所研究的成果，或留待其他專家去探討。十七年來，我斟證史記的感受，也可說是斟證史記所領略到的甘苦，大約有三種：一、平淡無奇。經常解決一些普通問題，只是一條一條地寫下去，雖然不感到沈悶，也不感到新鮮。二、興高采烈。有時解決前人不能解決或根本未注意到而又很重要的問題，比如庖丁解牛後那種躊躇滿志還要得意。三、忍氣吞聲。有時一個問題，想了很久，都不能解決，要放棄，又捨不得。要清理，又沒頭緒。真是有『剪不斷，理還亂』之苦！沒奈何，只有再慢慢想了！這三種感受，我想，凡是下苦工研究學問的人都經歷過的，不僅我斟證史記而已。

柒、結 語

我研究學問，是以愚自守，從不敢逞聰明。三、四十年來，從事整理古書最笨重的工作，斟證史記，就費我十七年大部分的心力。不過是解決一些支離破碎的問題，這只是一種糟粕之學，對學術說不上有多大的貢獻。我在南洋大學教書時，每天斟證史記困倦了，晚上散散步，南大有個南大湖，湖畔疏疏落落點綴幾朵睡蓮，我散步後坐在石磴上，欣賞睡蓮慢慢開放。記得六十三年（一九七四）八月八日晚上七時許，我在南大湖邊口占一首絕句，題目是『喜看』：

斟證遷書年復年，服知勤志毫毛顛。及時領略生生意，喜看秋湖出水蓮。

『服知勤志，』出於莊子，寓言篇：『莊子謂惠子曰：「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始

時所是，卒而非之。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孔子勤志服知也？」莊子曰：「孔子謝之矣。」』一般普通人不知如何『勤志服知，』我們知識分子經常在『勤志服知。』像孔子這樣大智慧的人，莊子認為已經超絕『勤志服知』了。我斟證史記十七年，不過是『勤志服知』而已。所謂『毫毛，』也本於莊子，列禦寇篇：『小夫之知，不離苞苴竿牘，敝精神乎蹇淺，……汝爲知在毫毛，而不知大寧。』我斟證史記，每天浸潤在書本中，勞形耗神，所得到的知識，不過如『毫毛』而已，甚至於如毫毛之顛而已。這是『小夫之知，』說不上什麼。昔王念孫稱錢大昕的史記考異，『足爲司馬氏功臣。』（史記雜誌序。）梁玉繩的史記志疑，也可當之無愧。我只是盡一己之心力，不敢自以爲是。希望後起之秀研究史記的，有更多更好的成就。

七十年八月卅一日脫稿於南港舊莊歷史語言研究所。